

“松中”是个好地方

李大可

一、优良校风

松中是个好地方！你看，那白杨挺直地长！你听，那小鸟儿自由地唱！这儿年轻又活泼，这儿有热又有光！松中是个好地方！

“我们有纯洁的灵魂，我们有崇高的理想！加紧学习，努力向上！大家努力发掘啊，发掘那知识的宝藏！松中是好地方！”

这是解放前重庆松花江中学在中共地下党领导时期，全体师生员工经常怀着自豪的心情，引吭高歌的校歌歌词（曲谱略）它体现了松中的特点，它的作者使用象征、比喻、抒情手法，鼓舞大家追求光明的未来，憧憬美好的明天，为实现崇高理想而奋发向上，孜孜不倦地学习和工作。

松中地处山城重庆南岸鱼洞溪白杨沟，距市区约60华里，距南温泉约8华里，距鱼洞镇约6华里，面向长江，背靠川黔公路。那里虽较偏僻，交通不大方便，但也绝非“世外桃源”。

松中的学生多数是劳动人民子女。他们大多来自附近的农村，来自华西汽车修理厂和道角电厂；也有少数来自市区。勤劳俭朴，勤奋学习，是他们的本色。

松花江中学的师生们，一说到松花江，就自然想起

“九·一八”事变，在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和抗日战争时期，那满腔悲愤、催人泪下、促人奋起、风靡全国的抗日救亡歌曲《流亡三部曲》，就是以“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开头的。因而常使人产生重温痛史，从而激励人们去奋发图强。学校当初以松花江命名，想必包含着这一深意。的确，松花江中学正是抗日战争时期由东北人创办的，多数师生都是东北人。他们饱受国破家亡，长期流亡之苦，爱国主义思想和民主主义思想及其作风就成为松中的优良传统校风。抗战胜利后，师生们都回东北了。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们党就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一九四六年，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副书记张友渔又提出反独裁，废除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主张民主宪政。中苏文化协会总干事张西曼、曾任《新华日报》副刊编辑的学者吴藻溪、甘祠森等发起组织成立“民主宪政促进会”，为了扩充中共地下党、民主党派革命活动的阵地，吴藻溪以“民主宪政促进会”领导人身份，要求其成员蒋宗仁、李廷荣、李廷华想办法作通他二叔（当时鱼洞镇长）李仲贤的工作，以教育树人、积德爱才、名利双收为理由，劝说叔曾祖李盈庭廉价买下了松花江中学全部校产，其中包括五十多亩田产由李盈庭、李仲贤等组成董事会，李盈庭任董事长。

一意孤行的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攫取八年抗战的胜利果实，顽固地坚持其法西斯一党专政、背信弃义、不顾全国人民争民主、反内战的强烈愿望，全面地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吴藻溪则安排“民主宪政促进会”的成员李廷荣到松中复习功课，了解师生情况，籍以掌

握学生会领导权。与此同时，中共地下党的同志早已授命在松中任教并有相当群众基础的进步青年教师杨修平同志，把握时机，通过关系，取得松中校长职务，以利安置大批地下党员和民主进步青年到学校任教，并以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为榜样，将松花江中学办成生气勃勃、有热有光的民主、进步的新型学校。

二、建立据点

在成都四川大学历史系，曾被人尊称为李姐的李惠明，中共党员，大邑县人，因同乡关系而了解杨修平从一九四五年起，就接受《新华日报》社王棣华等人领导，是一个思想进步的青年。一九四六年秋，杨修平由重庆松花江中学回大邑三岔乡奔父丧，几次拜访面晤李姐，并向李姐汇报了思想和在松中任教的情况。在几次的会晤中，他们既讨论了当时全国的形势，也交流了成渝两地政治斗争的情况，还分析了松中的环境、开展工作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使杨修平深感李姐对自己政治、思想、生活上的关怀，愉悦诚服地敬佩李姐。李姐则以酷似姊妹的深情，向杨提出要求：必须在寒假前赶回松中应聘，伺机控制这所学校作为基地，以便掩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在那里生活和展开工作，把松中办成育才似的新型学校。

一九四七年一月底，杨修平从成都返重庆，回到松花江中学。由于他在该校任教师、训育主任时的基础，因此，很顺利地接到了松中外语教师的聘书。接着他向自己的未婚妻白远富（现名白静平）传达了李惠明的意见，并研究如何付诸实施问题。（白是吴藻溪的学生，在吴所办的“适用工商

专科学校”任职时，由吴介绍她参加“民主同盟”）。为了集思广益，白又邀请平日信得过的朋友王德裕（民盟盟员，后加入共产党）、周静波（民盟盟员）参加研究。决定：一、利用当时松中校长周恭先与董事会的矛盾（主要是学校经费开支的矛盾）开展工作；二、依靠当时学校事务员李盈庭养孙李朝明支持，特别要依靠李盈庭侄曾孙李廷荣（现名李大可）的合作与大力支持。因为吴藻溪在派李去松中的同时，蒋宗仁已把吴与白远富的关系和白的政治面貌向李作了交待；而白早在适用工商专科学校任职时，就已掌握了李的情况。李廷荣一到松中，白就向杨介绍：李是民主宪政促进会成员、“农村科学出版社”在鱼洞镇的秘密投寄员。所以，杨对李十分信任，李对杨也很器重，两人同住一寝室，经常促膝谈心，很快就成了志同道合的同志。

在这学期里校长是周恭先。由于各种原因，学校十分混乱。李盈庭接办松中一年半来，已换了四任校长，不但未赚到钱，反而赔本。他大感恼火：想停办吧，一怕校产被巴县教育局没收；二怕被人耻笑，影响个人声誉；不停办吧，必将继续赔本。他感到骑虎难下。

正当此时，杨修平按照李惠明“利用矛盾，取得学校领导职务”、“经济权可让，用人权绝不能让”等主意，及时地与王朴（中共党员），王德裕等人磋商并决定：先由李廷荣、李朝明出面，去找他们二叔李仲贤（松中董事，鱼洞镇长，开明人士，现已退休）。向李盈庭推荐杨修平作校长；然后由杨修平、王朴等人出面，与董事会谈判。杨等采取在经济上“明争暗让”的策略，终于达成协议：校长全部掌握用人权，实行“以校养校”，董事会不另外花钱。李盈庭提出

的唯一要求，是要杨修平找好铺保。恰好，白静平族侄孙白宪荣正在鱼洞镇经商，他成了杨修平的铺保。

从一九四七年八月，杨修平就任松中第五任校长，也是松中任期“最长”的校长。八月中旬，周戈西（原名周培伦，大邑同乡，后入党）和李惠明先后来到松中。李姐是松中挂名的女生管理（实际由白静平兼代）。

此外，经各种关系介绍，以松中为据点，在松中长期或短期食宿，而在校内外从事地下活动的除周戈西外，还有石祖传、马秀英、梁维德、郭一帆、潘岱忠、张柏林、罗广、邓明秋、朱虎庄，盟员张淑延、蒋宗仁。

一九四八年，在蒋宗仁任巴县教育局视导员期间，为了扩大革命力量支持李廷荣夺任鱼洞镇中心小学校长，但因蒋被重庆特刑庭通缉逮捕而潜成都未果。后来只是通过李仲贤与新任校长谈判，得以安插了来松中食宿、在校内外从事革命活动的部份进步青年去鱼洞中心小学任教。

三、新型学校

一九四七年下期开学不久，经李惠民、贺天熙、杨修平、郭仲衡等人初步研究之后，便召开全体教师会议，经过民主讨论，制订了松中的教育方针：以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所办的育才学校为榜样，贯彻“民主教育，为人民而教，为人民而学，教学做合一，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方针。

贯彻上述教育方针的结果，使松中很快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一、采用进步教材。语文课采用开明书店《新编开明国文读本》，教师可以自选文学名篇。历史课以范文澜、翦伯

赞、邓初民等人的教材进行教学。公民课实质上是政治课，则坚决抵制当时通用的教材，由教师自编自选，对学生进行革命思想和时事教育。

二、加强形势教育。松中的作文教学，总是结合当时的形势命题，如：《金元券发行后——民间故事一则》、《我对徐州会战的看法》、《我理想中的政府》、《松中颂》、《新年颂》、《青年与时事》、《教育的比较》、《寄坎珂的人》、《中学生应有的学习态度》、《黎明前的黑暗》等。有一个作文题目是《风风凄凄话松中》，颇耐人寻味，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控诉和挑战。学生廖际英用一句饱含深情的话开头：“松中，我敬爱的母亲！”夏元彬在文中以必胜的信心写道：“黎明前是最黑暗的，但真理的甲冑必将战胜一切邪恶！”谭从云的文章在结尾写道：“现在群魔乱舞，但这只是黑暗的终点，也是光明的起点！”

三、扎实抓好教学。教师把教学抓得很紧，除课堂教学认真外，早晚自习还认真辅导，并推行“小先生制”，以鼓励互助互学。星期天和寒暑假，组织学生补习。

四、开展丰富的文娱活动。在周末晚会上，在每天早晚集合整队时，都高唱校歌《松中是个好地方》和革命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山那边哟好地方》、《陕北民歌》、《古怪歌》、《我们不流眼泪》、《你这个坏东西》、《热血歌》、《船夫曲》、《读书郎》、《夫妻对唱》、《茶馆小调》等。还不时组织歌舞晚会，跳秧歌舞。师生常在一起打球、做游戏、讲故事、排演话剧和歌剧。

五、革命家庭温暖如春。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彼此关心，互相爱护。对家境特别困难的学生实行减免学费、书籍

费和伙食费，又实行动工俭学，如种植蔬菜等等。只要谁一有病，大家就煎汤熬药，轮流看护。深夜，老师查铺，给学生盖被子。大同学帮小同学洗衣。女同学帮男同学缝补衣服。师生间建立了纯真、亲密的感情：老师被同学亲昵地尊称为“妈妈”；学生会主席李廷华被男女同学称为李大哥；廖际英称为廖大姐。

松中的其他重要活动，还有如下几种：

一、政治时事教育。在初中、高中组织学生读报，并教给学生如何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判断时局的发展变化。利用周末晚会或不定期地给学生作政治时事报告和举办多种讲座。主持人有李惠明、贺天熙、杨修平、徐明松、许志伟、陈益民、龚克宽等人；也有客居松中的和来自校外进步人士作报告。更多的是对学生个别谈心，灌输革命思想，组织学生到附近农村访贫问苦，开展社会调查。

二、诗歌晚会。陈益民、钟博琼曾多次主办诗歌晚会，以朗诵师生自己的诗作为主，也朗诵当代人的诗作。如郭沫若的《地球，我的母亲》，高兰的《哭亡女苏菲》，鲁黎的《泥土》，田间、艾青等的作品。学生常伯华朗诵自己的诗作《新年颂》，博得了师生们的赞赏。全诗如下：

“新年到了真热闹，弟妹们蹦蹦跳；见了爸妈问声好！小狗的尾巴摇几摇。

“新年到真热闹，穿新衣戴新帽；锣鼓响狮子跳，劈劈叭叭放鞭炮。

“新年到不热闹，穷孩子没衣帽，手捧破碗沿街讨，饱受饥寒多烦恼！

“看吧，天快亮了！人海掀起汹涌的波涛；不愿做奴隶

的人们，奋起吧，快迎接新时代的来到”！

三、纪念鲁迅，学习鲁迅。老师向学生讲述鲁迅及其作品，指导学生学习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革命精神。

四、搞好节日活动。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五·四”纪念日都是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好机会。用多种形式把节日活动搞好。还开办工人夜校，帮助华西汽车修理厂的工人学习文化。常开展球类比赛、举办文娱晚会，使松中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气象。

四、《突击》始末

一、《突击报》是在什么条件下办起的：一九四七年二月，我党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机关报——《新华日报》被迫停刊。而广大革命群众，迫切需要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和解放战争形势。在这种情况下，一九四七年上半年，重庆市委先后出版了地下油印刊物《挺进报》和《反攻》，以传播党的声音，鼓舞革命斗志。与此同时，还有一些革命青年，根据他们得到的资料，自动印发过一些不署名的地下刊物，其中持续时间较长的是《突击报》。它是由地下党员和一些进步青年负责编印的油印小报。曾在部分进步教师、学生和工人中有着极大影响，引导他们从事革命斗争。

在杨修平任松中校长期间。一九四七年下半年到松中任教的有：许智伟（长期从事进步活动，一九四八年入党，烈士）、张孟晋（即张宝玉，共产党员，烈士）、宋融（育才学生，也是育才小学教师，原名宋昌达，一九四七年起在许建业领导下搞工人运动）、常德群（原名常显龙，一九三八

年入党，一九四〇年被捕后失掉联系，一九四九年六月重新入党）、郭仲衡（农工民主党成员，解放后该党重庆市负责人）、章伯俊（郭仲衡妻）、甘敬虞（育才学生）等。由郭仲衡任教务主任，贺天熙（即贺一然）任训育主任，徐明松任事务主任。学校实权掌握在革命同志手中，是当时重庆进步教师活动的一个据点。《突击报》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产生的。

二、突击报的组织纲领和刊出情况：《突击报》一九四七年十月初出刊。尚在八月间，贺天熙约请宋融到松中，曾讲过在松中不只是教书，还可搞个油印刊物，为革命做点事。这种想法不约而同地已在王德裕心中酝酿着。开学后，贺天熙（李先念部队入党，突围回成都与川西党组织联系后，转到重庆隐蔽）、王德裕、许智伟三人多次商议具体办法，取得一致意见后，又分头约几个信得过的朋友参加。一九四七年九月中旬，贺天熙、王德裕、许智伟、郭仲衡、宋融、徐明松六人开了第一次会。贺天熙发言说：“重庆已有《挺进报》和《反攻》两个地下刊物，我们这个就取名为《突击》怎么样？”徐明松当时只知道贺天熙是共产党员，不知道其他人的情况，也不知道事先他们三人曾商议过，就问“我们搞这个刊物由谁领导？”回答是：“当然是共产党”。接着，商定以新民主主义为办报纲领。考虑到《挺进报》是以消息报导为主，《突击》则可以评论为主，以报导解放战争的形势，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罪行，号召革命青年到群众中、到农村去组织武装斗争等为主要内容。并确定以“突击社”的名义发行。选出贺天熙、王德裕、许智伟为主编，宋融负责刻写油印和发行。参加人都动手撰写文章。

资料来源主要是从当时在香港出版的《群众》和上海出版的《时代》等杂志上寻找材料，改写为文章。也可对一些反动文章给以驳斥。《突击报》先是油印小报，后改为期刊小册子。经费由参加人出资，也向进步朋友募集。第一次六人会后，又吸收了张孟晋、常德群参加。

一九四八年初，部分同志因故撤离松中，同年三月再由许智伟、屈尚先、彭时淮、徐明松继办。由许智伟、屈尚先任主编，屈刻写，彭油印，许发行，组成第二届编辑。此报（刊）到一九四八年六月停刊。先后两届，历时近十个月，总计出刊了十期。

一九四七年下半年的发行工作主要由宋融负责，他只有半席课，每周都给他留几天空堂不上课，便于他外出活动。一九四八年上半年则由许智伟负责。发行对象主要是教师、学生和工人。重点发至二十一兵工厂、豫丰纱厂、南林中学、建川中学、嘉励中学、正阳学院、乡建学院等处，也通过横联系，与《挺进报》、《反攻》交换发行。

三、《突击报》办报过程和停刊原因：一九四八年元旦，王德裕、许智伟到嘉励中学会到了余少文、蒋仁风两同志（均是中共川东地下党员），谈了松中及《突击报》的事，余、蒋两同志根据当时形势，指出松中革命力量太集中，发行《突击报》如果一旦暴露则损失太大，建议暂停发行，疏散人员。经过商量，最后决定停办《突击》，撤走一部分人。宋融当过钳工，与二十一兵工厂有人缘，决定“打进”二十一兵工厂作工运工作；王德裕、郭仲衡、张孟晋通过各自的社会关系到其它学校教书（后来王德裕到蜀都中学，郭仲衡、张孟晋到建川中学）；徐明松放弃巴县高农校工作

来到松中，与许智伟分别担任教导、训育主任，仍然掌握松中的实权；贺天熙又介绍川大同学屈尚先来松中教书；彭时准、钟博琼、郭一帆、林素莲、张启蜀等也来松中任教。不久由许智伟、徐明松、屈尚先、彭时准等负责，《突击报》又悄悄地在松中恢复出刊了。许非中共党员，于一九四八年六月入党。一次许拿了《突击报》给卢光特看，征求意见。卢根据当时形势，认为《突击报》应该停刊，人员必须转移，就这样，《突击报》又停刊了。《突击》是由部份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根据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创办的，而后来的两次停刊及撤退计划，也都是遵循重庆地下党的指示而办的。办报时间虽不算长，但她在团结进步青年参加革命斗争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五、危急时刻

从一九四七年二月起，松花江中学就逐步成为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校。特别是从同年八月起，李惠明、贺天熙、王德裕等人来到松中后，进一步加强了党在松中的领导。学期开始，该校因师生反对而停止每天升降“国旗”，唱“国歌”，这使敌特大为恼火，乘机在校外制造舆论，说松中赤化了，校长和多数教师是赤色分子，异党分子等等。学校为了避免暴露，便指定学生夏元彬负责每天把“国旗”升上去，傍晚把“国旗”降下来，但仍不唱“国歌”，使矛盾暂时得到缓和。由于党的领导的加强，学校呈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在那目不识丁只图赚钱的李盈庭，也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对于敌特散播的不利于松中的流言蜚语，他一概置之不理。

解放战争不断胜利，国民党反动派日暮途穷疯狂进行垂死挣扎，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这就使松中有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一九四八年上期，租种松中田产的反动佃富农黄××经常捣乱，窥探松中师生的活动，向敌特通风报信。鱼洞镇上的特务和松中的反动学生、反动佃富农相互勾结，对松中师生恶意攻击。大家分析，要抵制敌人的攻击，关键要稳住李盈庭。李早年当过团阀，是鱼洞镇大资本家、大地主、袍哥舵把子、地头蛇、巴县县参议员，是方圆数十里的头面人物。只要他不表态，特务是不敢下手的。为此，李盈庭的堂曾孙李廷荣和养孙李朝明，曾多次陪同杨修平去对李盈庭作释疑工作。同时李廷荣又常去找李盈庭信得过的堂孙、开明人士、鱼洞镇镇长、松中董事李仲贤从中斡旋，使松中师生度过了相对安定的一年。

之后，形势又起变化，松中地下党的处境日益险恶。一九四九年元旦后，李廷荣去见李盈庭，意在缓解敌特对松中的攻击。适逢特务许秋儒正在那里向李盈庭汇报松中情况。李盈庭先对李廷荣怒目而视，斥责他说：“你干的好事！你装糊涂，说杨修平不是共产党，学校也根本没有共产党！”李廷荣说：“这是有人想当松中校长，所以造谣生事，想把杨修平赶走。”特务许秋儒反驳说：“这可不是谁想当校长的问题，不只是杨修平，还有一大帮人是共产党！”李廷荣怒声道：“你有什么根据？简直是无中生有，乱咬好人……”冷不防李盈庭突然举杖击打李廷荣，狠狠地骂了李廷荣一顿。

随即，杨修平由李盈庭的养孙李朝明陪同，再次前去面见李盈庭，想再作释疑。谁知李盈庭一见，就要举枪打死李朝

明（幸被人劝止），斥责他不反映松中的真实情况。

在李盈庭的怂恿下，特务和当地的反动势力进一步勾结，制造了离奇的骇人听闻的谣言。特务詹明熙故意询问李廷华：“你听说过杨修平一伙人要暗杀董事长吗？”“你听说过杨修平等人在一次晚点名时公开说，拥护共产党的站到这里来，拥护国民党的站到那边去吗？”还说：“学校常有可疑的人来往，你难道不知道吗？”等等。这是危险的信号，是敌人企图下毒手的前奏。得知了此一情况，经过陈益民、汪丹忱、杨修平等研究，为了保存实力，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决定迅速分散转移。这样，松中只得提前放寒假。

六、火种不灭

一九四九年二月，朱虎庄、白远富、杨修平、姚雪崖、陈益民、徐明松、汪丹忱等大批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撤离松中。只有刚来松中不久，尚未暴露身份的梁振麟留下，以教师职业为掩护坚持战斗。

这时，松中校长是特务郭克锦，他是伪“国大”代表卢俊卿（系界石乡伪国代）的女婿。训育主任赵国柱，也是特务，都十分反动，郭公开宣称：“我到松中的宗旨，就是要清除杨修平一伙人的余毒！”此言激起了大多数学生的不满。

郭从南风中学领来约十名学生，这些学生，不认真读书，受郭支使，充其耳目，在郭的挑唆下，乱校闹事。松中学生，分裂成了对立的两派，新来的学生以刘××为首为一派，原有的学生以李廷华为首为另一派，刘派中的钱邦成被争取过来，成为李派的骨干。李派中也有叛逆者，如詹×

×。刘派的后台是郭克锦、李盈庭的长孙李献君，以及鱼洞的大小特务。李派没有后台，但有进步教师梁振麟的支持和领导，以及教师任可风等人的同情。

郭克锦在一次晚点名时，训斥、威胁学生们说：“有人不专心读书，成天东议论，西议论；谈论国家大事是犯法的！我郭克锦是绝对不允许的！惹出麻烦事来，我是不管的！杨修平一伙人的那一套行不通了，看谁硬得过谁！”梁振麟随即召集骨干学生开会，会上梁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的原则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能让他们骑在我们的头上。我建议成立一个组织，与他们作针锋相对的斗争！”经过讨论，一致同意成立“清算委员会”，选举李廷华任主任，夏元彬、薛定芳任副主任。会议作出决定：今后的一切斗争，在梁老师的指导下，在清委的领导下进行。

尔后，清委出了墙报，对郭的反动言行，对毛×等人的下流行为，给予无情的批驳、清算。可是，墙报刚出版，就被撕毁了。对此，清委出面质问郭克锦，并要求严肃处理此事。郭说：“谁叫你们出这样的报！”接着对方有恃无恐，竟大打出手，双方发生了斗殴。

在竞选学生会主席时，斗争尤为激烈，由于对方出口伤人，又发生了打架事件。

白色恐怖日益严重。为了梁振麟的安全，在学生的劝说下，他撤离了松中。

1949年6月初的一天晚上，钱邦成、谢光舜被捕。清委四处打听，设法营救，他们被关了半个月才获得自由。同年暑假中，李廷兴看守学校。李廷华和几位同学邀请梁振麟从南温泉寒村坝来校一叙。正在吃午饭时，七、八个特务

闯进学校，梁振麟在李廷华等的掩护下才脱了险。

同年8月为了安全，李廷华化名李梦飞，同李廷兴一起，经梁振麟介绍，进了重华学院学习。

黑暗已经过去，曙光终于来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松花江中学这块培育革命青年的沃土，显得更加美好。

一九九〇年五月十二日

巾帼英才李伯钊

陈宛茵

剧作家，戏剧教育家李伯钊，巴县人，生于1911年。1924年她考入校址在重庆的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次年加入共青团。同年，她到上海，组织上派她去办平民夜校，从事工人运动。是年冬又奉命到莫斯科劳动大学学习，开始了文学创作。1929年李伯钊和在劳动大学一起学习的杨尚昆结了婚，1930年夫妇俩奉调回国。

李伯钊回国后在烟厂工作。1931年秋去江西瑞金，那时她已是中共党员。在瑞金李伯钊曾担任过中央红军学校政治教员，《红色中华报》编辑，高尔基戏剧学校校长等职务。不久，即跟随红军长征。在长征路上，李伯钊和其他革命战士一样，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她曾三次过雪山草地。

第一次，李伯钊在一方面军工作，过草地后，组织安排她去四方面军工作。工作不久，她接到杨尚昆《致红三军团政治委员》一封信，要她回一方面军北上抗日。当时，张国焘反对北上抗日，李伯钊已有所闻，便立即请假去一方面军，走到半路便被张国焘派人拦截回去。不久，四方面军重返懋功，这样，李伯钊就第二次过了草地。

后来，张国焘在松岗召开会议，竟公开与中央对抗，并威逼正在四方面军的红军总司令朱德跟他一起走，但遭到朱总的严词拒绝和批评。李伯钊与朱总熟悉，就向朱总请示

说：“总司令，我今后怎么办呢？”朱总严肃地答道：“他要是打红旗，就跟他走；要是打白旗，就跟他斗！”

1936年6月，李伯钊等在甘孜、懋康一带行军时，遇上了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她向他们叙述了自己在四方面军的所见所闻。任弼时、贺龙等同志便立即作出决定，让李伯钊留在二方面军工作。于是她便跟随二方面军第三次又过了草地。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李伯钊曾任鲁迅艺术学校党支部书记，还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任过职。解放后她担任过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党委书记，北京市文联副主席等职。她一生从事文艺创作，主要作品除《老山》、《农村曲》外，还有话剧《母亲》；小说《女共产党员》；秧歌剧《送红袄》等。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时，李伯钊编写的新剧《北上》第二次搬上了舞台。此剧在开国时初演，即以最早表现长征和塑造人民领袖毛泽东的形象而震惊中外。

1986年4月，李伯钊逝世一周年。是年7月7日，北京首都剧场举行了李伯钊文艺作品演出纪念会。这次活动，是由中顾委副主任王震同志倡议的。演出前王震讲话，赞扬李伯钊是“革命根据地我党我军文艺宣传工作的开拓者之一。”作家丁玲撰文誉称她“是一个晶莹的透明体，是没有瑕疵的纯洁的人。”《解放军报》的文章说：“她不愧为奋勇搏击的中华女性，一代巾帼中少有的英才。”